

83岁的作家李敖自2017年1月确诊罹患脑瘤,被传“乌龙死讯”后备受各界关注,好友陈文茜形容他“生命在倒数”。2月初,李敖在其微博公布新书《李敖自传》简体版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,这也是他的微博停更半年之后,为宣传自传再度发声。

【人物志】

人生是我的,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
李敖八十岁写下『风流自传』



1949年,一个十四岁的少年随着家人登上了前往台湾的轮渡。他出生在日伪政府统治下的东北,成长于战乱动荡的年代。没有人知道,他今后会对华人世界、华语写作产生何等巨大的影响。这个人,就是自诩为“中国白话文第一人”的李敖。

不论了解与否,知道李敖的人,都会对他产生两个印象:一个是“厉害”,另一个是“怪”。

李敖的厉害,首先就体现在他的天才。他“小升初”考北京四中,父亲跑去看榜,从后面看起,看了好半天,没有“李敖”之名,原来是考了状元。初中跳级,高中退学,先是考上了台湾大学法律系,读得不开心,退学再考,又考上了台大历史系。因为书读得多,脑子又转得快,每到上课,最大的乐趣就是挑老师的错,而且毫无忌惮,一旦抓住纰漏就当场指出,加上性格强势,经常和老师在课堂上争一个面红耳赤。

据传,当年他在台大临近毕业,参加论文答辩,进了会场,面前的三个教授面面相觑,一言不发,双方就这样静坐了半小时,终于一个教授开了口:“李敖,你答辩通过了。”李敖诧异:“你们什么也没说啊,我也没讲话啊。”教授无奈道:“我们知道一开口肯定会被你驳倒的,所以还是不说了。”可见李敖的博学和雄辩,在年少时就已锋芒毕露,令人自叹弗如。

李敖博学,是因为他饱读诗书,无所不看,好书他要看透,不好的书他也要读,因为不通读就没有资格去骂,他说:“我骂人的方法就是别人都骂人是王八蛋,可我有一个本领,我能证明你是王八蛋。”

如今,他仅在台北金兰大厦的物业里就有“十万藏书”,但实际上他有多多个书房,藏书总量达到了几十万,比起小规模图书馆,也不遑多让。

博览群书者,往往下笔如有神助。不得不说,李敖写文章的功力,堪称一绝。一方面是写得多。李敖从十二岁小学六年级在北京的《好国民》杂志发表文章,80岁写自传时,足足有68年的发表资历了。他至今出版图书(不含重复发行的)超过一百本,公之于众的文字总量超3000万字,笔耕不辍,可谓业界劳模。另一方面李敖文章的质量实属上乘,散文、小说、诗歌样样精通,在最为人称道的杂文写作领域,自他成名后,罕逢对手。

李敖很少写小说,出名的有《北京法源寺》一本,并因它在2000年前后,提名了诺贝尔文学奖,轰动两岸。

西方媒体更捧他为“中国近代最杰出的评论家”。读李敖的文章多了,很容易就能发现,他的文章风格从来只有一种,那就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,旁征博引信手拈来。提到中国的诸子百家,他能侃侃而谈。关于《论语》的研究独树一帜,对古典文化的理解深刻而精到,可他又大力鼓吹西化,主张“自由主义”,身处矛盾之中,却游刃有余。他分析论断过很多人,

研究胡适成了胡适研究权威,胡适亲口说:“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。”

至于李敖的“怪”,我们则可以从更多角度观察到,因为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,根本不屑于什么“君子慎言”和“大隐隐于市”。因为他永远是叛逆的,永远是自由的。在他火热的时候,曝光量甚至能压过娱乐圈当红大咖,话题度高的李敖,不仅经常光顾杂志娱乐版,更是政治版面、社会版面的常客。1995年至今,他参与电视节目制作,主持超过十档脱口秀,出境过的节目更是不计其数。在《康熙来了》中,他三言两语辩得小S招架不住,两人曾掀起数波骂战,一度闹上法庭。

李敖当过兵,任过少尉排长,入伍岁月更让他看清了人间荒唐。后来他因为对抗国民党当局,被捕入狱,直到蒋中正病逝才得到大赦,实际在监狱里呆过五年又八个月。李敖自己都说,锻炼一个男子汉最好的地方有两个,一个是军队,另一个是监狱,这两个地方他都有刻骨体验。

李敖的从政,不像胡适等老一代知识分子,是半推半就地步入政坛,而是很主动地靠近政治。他从小到大都对政治异常敏感,是个极为关心政治的文人。2000年,他参选“台湾地区领导人”并落选。2004年他参选“立法委员”并获选,放出狠话,要让那些坏、贪、恶官们“官不聊生”,之后果然爆出一大闹“立法院”的新闻。2008年,李敖任期结束,宣布退出台湾政坛,时年73岁。2011年,他食了言,重返政坛,大张旗鼓地复出,仍然野心勃勃。

他说:“前进的理由只要一个,后退的理由却要一百个。许多人整天找一百个理由证明他不是懦夫,却从不用一个理由证明他是勇士。”成名以来,他敢写敢骂敢闹,在台湾地区风生水起,不停地生产“禁论”“禁书”,遭禁著作多达96本,谈古论今,针砭时弊,集百家争论,成一家之言,每每以尖刺的嘲讽,刺激着民众的神经。

在台湾人眼中,这个盛名加身的“怪才”,如同台湾社会的一面照妖宝镜,一尊怒目金刚,任何龌龊苟且都瞒不过他的眼睛,只要被他发现,就非得拖出来,无论多高的地位,多响的名头,都要丢进文章墨海里惩治一番,狠狠鞭挞,容不得丝毫蒙骗,他骂过的人,有名有姓的就超过了三千人。

他的颇多行为也被批为偏激,不为世人接受,常令他感叹知己难求。和初恋女友分手,他吞药自杀,被抢救回来,第一次经历了生死。社会流行欧美服饰,他却天天突兀地身着长袍走进校园,为人侧目,称他“长袍怪”。父亲去世,千人送葬,他痛恨传统陋习,认为哭丧是封建愚昧,偏不下跪,如此种种,使人愕然。

同时,他又有温柔的一面,老师严侨被捕,他感伤之余,在退学自修的情况下,省吃俭用,接济师母多年。为了帮助在台的慰安妇,他拍卖了自己的许多珍贵藏品,筹款一百万美金,全数捐出。

李敖好色,人尽皆知,前半生风流韵事不断,但与王小屯婚后,收心归家,再无绯闻。

最难能可贵的是,尽管为人离经叛道,但在祖国统一的大是大非上,他一向头脑清醒,坚定不移地支持“一国两制”,经常在采访、作品中对台独势力口诛笔伐,疾呼“一个中国”,保持了一个文人应有的良知和远见。

(满喜喜)

【史中风云】

陈寅恪破格当教授,过程很费劲

□杨津涛

网络上流传着很多“民国大学聘任教授不问学历”的鸡汤故事,“梁启超向清华校长举荐没有学位的陈寅恪”,“西南联大聘任小学学历的沈从文引起刘文典不满”,是其中最著名的两则。其实,这样的鸡汤,与真实情况不符。无学位的陈寅恪,非常费劲才当上清华教授。

这个故事最早出自陈哲三所著《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》。按照书中说法,1926年春,梁启超向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,希望他到国学研究院任教:“曹说:‘他是哪一国博士?’梁答:‘他不是学士,也不是博士。’曹又问:‘他有没有著作?’梁答:‘也没有著作。’曹说:‘既不是博士,又没有著作,这就难了!’梁先生气了,说:‘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,著作算是等身了,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。好吧,你不请,就让他在国外吧!’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、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。曹一听,既然外国人都推崇,就请。”于是,陈寅恪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。



陈丹青油画《国学研究院》,依次为赵元任、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吴宓,其中梁、王、陈三人都无现代大学学历。

其实这里面存在不实之处。首先,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聘请导师是在1925年,而非故事所说的1926年。其次,梁启超对陈寅恪的研究能力并不了解,如学者桑兵所言,“梁与陈家可谓故交,但陈寅恪是晚辈,又长期求学于欧美,对其学问人品,似无从了解;所谓德、法等国名教授推崇之语,没有旁证。梁与陈所结识的欧洲学者,并非同一类型,前者多为思想哲人,后者则为东方学者或汉学家,担任过陈氏课程者,与梁并不相识;除几封信函外,当时陈尚无只字面世”,因此“在此情况下,梁不会大拍胸脯,极力举荐”。第三,梁启超受聘尚晚于陈寅恪。吴宓时任国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主任,他到天津请梁启超是在1924年2月22日,而曹云祥同意聘请陈寅恪是当月16日。

真实情况是,吴宓费尽气力,以辞职力争,才让清华答应聘请陈寅恪。

1925年,清华学校在曹云祥的主持下,刚刚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部,尚未对教授资格做出明确规定。参考1932年校评议会通过的《国立清华大学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》,可知要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,必须满足诸如三年研究院工作或具有博士学位等严格的条件,具体到国学研究院,聘任标准也有非常细化的要求,如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。

对于1925年的陈寅恪来说,后来清华大学有关教授聘任的条件,他一个都不满足。陈寅恪留学欧美十多年,在很多名校听过课,但没有拿一个学位;那时他还没有任何著作问世,更未在大学或研究院教过书。好在国学研究院的标准相对笼统,没有对学历、著作做出什么细致规定。即便如此,曾和陈寅恪在哈佛同学,深知其学术水平的吴宓,还是费了很大劲,才让曹云祥同意聘任陈寅恪为国学研究院教授,成为所谓“四大导师”之一。

吴宓后来回忆,他向校长曹云祥举荐陈寅恪后,“教务长张彭春认为陈先生留学虽久,学问亦好,然而一无学位,二无著作,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,为保证今后教授水准,不应放松聘任标准,不同意聘请。”吴宓辩称,“陈先生前后留学十八年,他人不过四五年。陈先生学问渊博,能与外国教授上下其议论,堪称学侣。虽无正式著作发表,仅就一九二三年八月《学衡》杂志第二十期所节录的《与妹书》,寥寥数百字,已足见其学问之广而深,识解之高而远。”

此事一度僵持,直至吴宓“往见曹校长,再申明前议,并以去留争,聘事乃决。”吴宓在日记中也说,“介绍陈来,费尽气力”。可见破格聘任陈寅恪之艰难。

今人传播陈寅恪被“破格”聘为教授的往事,添油加醋之中,往往专注于“破格”二字,而忽略了当日的清华对程序、规范的坚持——吴宓以“国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主任”的身份,不得不以辞职为筹码力争,才能让陈寅恪入国学研究院任教。——“破格”可以有,它为刚性的制度保留了一点弹性,但这弹性存在的前提,是必须有足够的“破格之难”;这种“破格之难”,才是民国大学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。